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儒家系列

韩愈评传

——转折点上的文化强人

成复旺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5.375 印张 插页6 120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册

ISBN 7-5435-2561-5/K·83 定价:9.9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

总 序

戴逸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宝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无数有益的东西。这其中包括加深对国情的了解、培养爱国主义情操,也包括汲取有益的政治经验、治国方略、管理方法,至于其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哲学智慧、科学思想则可以在更深层次上为我们提供借鉴和素材。

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是广大人民群众。一切文化现象都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体现。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随着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形成了文化的不同门类。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覆盖面更为拓展,文化的内涵日益深邃,在各门各类的文化活动中也涌现了各自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或者著书立说以成一家之言,或以自己的言论形成一种思想体系,或以自己的实践活动体现出一种文化精神。他们努力钻研,求实创新,把各个领域的思想文化步步推进,形成一个又一个高峰。这些文化名人如群星璀璨,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其数量之多真如恒河沙数。我们把这些明星贯穿成线,就构成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史。

广西教育出版社倡议编写出版“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一项有卓识有魄力之举，因此立即得到了各方面专家的响应，在几位著名学者主持下，分别组成各系列的写作队伍。由于作者大多长期从事有关方面的研究，因此很快完成了一批书稿。以作者队伍整齐，书稿质量高而言都是少见的。

本系列丛书没有采用学术著作的传统写法，也不对历史事实作子虚乌有的夸张演义，而是本着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传主的活动作尽量生动活泼的叙述。作者的观点或通过分析评论表述，或者寓于史实的叙述之中。对于学术界有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则尽量融会吸收。

本丛书所拟定的传主选题，代表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各方面，虽然各位传主卓然成家，足以彪炳史册，但却并非一定是完人。在他们身上既有耀眼的光华，又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历史和个人的局限，甚至不无糟粕。这与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在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要有清醒的头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称颂、肯定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时，也要取这样的态度。

最后，我要感谢广西教育出版社做了一件好事，感谢丛书的各位主编、作者和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希望本丛书能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挥作用。

是为序。

1994年5月

序

儒家文化精神的现代转生

张立文

广西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儒家系列》，这是一件好事。他们责我主编，我借机说说儒家文化精神等问题。

80年代初以降，中国大地掀起了文化讨论的热潮。在这文化讨论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曾成为人们论争的热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各家所见有异：有以儒家文化为代表或主干；有以道家文化为主干；有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为主干；或以中国历史上所建构的，并在学术思想界产生过影响的各种思潮为内容。这种种界说，都与界说者的价值取向不同相关联。虽解释纷纭，但都不否认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思想中起着巨大的、普遍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文化和伦理文化中具有主导地位。正由于这种状况，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文化论争也往往把问题聚焦到这一点上来。

论争儒家文化而不知儒家文化是什么，无疑是很遗憾的。这次选择各个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合为“儒家系列”，可补这方面知识之缺。

传统儒家文化在哪些方面蕴涵着向现代机制转换的因素、胚胎、萌芽？儒家文化在现代有否生命力？当前学术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以至如何继承、转换传统文化的方法，亦论

争不休。如抽象继承、具体继承、选择继承；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地解释、综合、创新；还有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论、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等等。凡此种种方法，都涉及主体的价值观念的问题。价值观念的不同，其所谓继承，其所谓体与用，都会不同；如何创造转化？如何创新？如何复兴？也会大相径庭。

因此，传统文化的转换和延续，不在于寻找它与现代化的联接点，或某一命题的继承，而是在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承传。文化精神与“传统文化”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一种生命力，后者是一种生成物。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文化精神的现代转生问题，而不是某种文化形态或静态的传统文化（生成物）在现代是否有存在价值的问题。这一点无论是汤因比、池田大作，还是 E·希尔斯，都没有能将文化精神作为一种传统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既定的传统及两者的关系和区别等论述清楚。

我们从儒家文化精神的现代转生层面上，来“观”儒家文化，可获得这样一些共识：

第一，整体主义的文化精神。人在宗法血缘的纽带，家与国同构的网络中，都有一个特定的位置，便是人存在的根据，并以人为中介，构成自然、社会、家庭的整体化结构。传统儒家文化讲天、地、人三才，此人是与天地对应的整体的人，蕴涵着社会群体，构成天、地、人一体化的整体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基本精神。在这种价值观念系统下的个人，便融化于整体之中；个人对于整体，义务重于权利，整体利益重于个体利益；个体价值只有通过整体价值才能体现，个人只有在整体（家族、集团或国家）中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存在意义；个人的意志、情感也只有在群体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这样，个体价值、利益、个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然而，却又培育出为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体利益，以他人、以集体为重的崇高情操；先忧后乐的高尚品格；重国家统一，反对分裂，

注重发挥集体智慧与力量的文化精神。

整体价值的内在深层蕴涵,是整体意识。这里所说的整体意识是个体意识错综复杂的总和,是一定群体所结成的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意识,它适应整体实践需要,维持整体的一定社会关系的利益,对克服损公利己、以权谋私等破坏整体社会秩序和利益的行为,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也是现代社会的需要。

整体意识见之于认知活动,便是整体思维。整体思维是指思维对象、成果和运用思维成果对思维对象的改造,都注重从相互联系的整体中反映对象、对事物作整体把握的整体观念。整体性思维方式影响着人的思维指向和思维的侧重点,超越经验思维方式,以完善理论思维方式,从而成为信息处理转换和生产一定精神产品的内在机制,转化成现代的思维形式。

中国的整体主义文化精神和日本的团体主义文化精神在现代仍有其重要的价值。

第二,人为中心的文化精神。儒家文化特别重视人、人的生命和人的生存。既以人为万物之灵,又以人为自然、社会的中心。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主体。文化正是通过对主体人的塑造而实现其功能的。儒家文化讲天上地下,人在中心。由人才把天地沟通起来,构成完整的宇宙世界。“为天地立心”,天地以人心为心;无人,天地万物只是自然的存在,而无所谓价值和意义。天地万物由于人的存在和需要,才有价值和意义。由于人的活动及其关系而组成社会。人的责任和力量,就在于能有组织性地改造自然、社会,创造为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以人为中心管理控制自然、社会,可使自然、社会按照人的周密、合理的安排,而发挥各个方面的作用和功能。世界上能把任何一种存在物转换成自己对象物的,惟有人,惟有人能自我创造。天地间惟有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惟有人能

协调、克服自我创造的高科技所带来的负效应,而继续自我创造。以人为中心的人的自我创造,才会发挥人的最大的积极性和潜在的创造性,把人从现代科学技术所造成的灾难和危机中解放出来,创造一个和合的世界。

第三,和合人文精神。和合是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诸如天地万物之所以生,人与自然、社会、他人的关系等,和合是一普遍的根据和原理。以发生学角度来看,和合是人们关于天地万物、日常生活、社会政治关系以及养生等对待多样性的冲突融合在思维中的展现。天地阴阳和合而生万物,夫妇男女和合而生新一代,万物人类并非主宰者上帝、神灵或绝对观念的创造,而是异质要素的和合。

和合本体是对于形上学本体论和上帝创世说的否定,以获得主体人与自然天地万物和谐发展的实现。和合作为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原则,使社会凝聚一起而不离散,和合既是社会和谐、安定的调节剂,亦是社会不分裂、不分散的聚合剂。和合这两种功能,它的现代转换机制,无论在处理现代社会、世界事务还是国家事务中,都是一条重要的原则。和合作为处理人际关系原则,“和而不同”、“和为贵”的精神以及无过不及,“恰好底道理”的度的把握,使人际关系获得和谐团结。

这种和合精神体现为天地万物与吾一体,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这并不是说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只有和谐,而无西方人的征服自然的意识。荀子以天为自然界,人与天各有职分和功能,人不能与天争职,天亦不能降祸福于人。天与人各尽其职,又能相互配合(能参),天与人互补,才能有天与人两极的协调和合。

第四,尊师重教精神。中国历来重视对人的教育,主体人一般指人的身心结构的统一,即人的物质存在形式与精神存在形式的和合。人的物质存在是社会生命存在的形式,人与周围的社会,自然有着密切的物质、知识、信息、情感的交换关系。中国先秦时代便已有这种自觉,并贯彻在对人的教育中,

形成了从胎教、家教到社会环境教育一套系统、完善的教育制度。先秦时便对胎教的重要性进行探讨,并对如何进行胎教作出示范。“周后妃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渲,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胎教之谓也”(《胎教杂事》,《新书》卷十)。食正味,听正声,给胎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心理状态。古人对少年教育人文环境的选择,亦非常注意。“孟母三迁”,展现了孟子母亲对少年孟子教育人文环境的重视。

在教育制度上基本有官办和民办两种。官方有太学、州学、县学等。私人有私塾、书院、精舍等,比较普遍,并深入穷乡僻壤,构成官、私互补互动的完整教育体制。孔子首创私人办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贵贱等级的限制,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并收很少一点学费(实物)。在教育方法上注意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培育学生真才实学,发展其智力。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很受尊重,成为“天地君亲师”之一。

中国古代之所以成为世界文明古国及其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都与对教育重视分不开。特别是在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代,教育是根本,没有教育的普及和提高,现代化就会落空。

第五,择优的精神。“学而优则仕”,2500多年前的孔子就认识到仕必须是学习知识的优秀者。文有文官考试制度,武有武官考试制度,文武官员都是这方面的内行、专家。国家各级官员,即现代所说的各级管理机构领导、公务员,是以“学而优”为标准,这样就把竞争机制引入教育和选拔官员机制,排除了任人惟亲,保证了官员的基本素质。

宋代初级行政管理单位是县,县的主要官员(知县、主簿、县尉)必须从获得国家最高级进士学衔的知识分子中选拔。从秀才、举人到进士,是经过各级严格考试而选拔出来的。从当时价值观来说,一般是优秀分子。经进士考试而上来的官员,被社会舆论所普遍尊重,认为是正途。一些享有荫恩的大官的儿子,也宁愿走科举的正途。从当时而言,进士出身的官员大抵是掌握了当时最高、最全面的知识精英,具有一定的行

政管理能力和水平。

第六,文化主体意识的自觉和责任感。文化主体意识是指具有思维能力并能动地运用物质和精神手段认知、创造文化活动的人,对于一定社会生活过程、条件在观念上的观照的自觉。诸如忧患意识,是人们从忧患环境的搅扰中,对于人性尊严和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体验,并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去超越忧患,而激发出承担责任的博大情怀。这种博大情怀直接体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救民的行为活动,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民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

儒家文化精神的这六个方面,是中国文化生命之所在,是过去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生命和价值,可称为历史文化生命。文化生命的延续,即文化精神的承传。任何延续和承传都是新的文化环境、条件下的延续和承传,是被新文化的环境、条件所改变、所改造的以及吸收内部各学派优秀成分和外来文化优秀成分和合而成的一种新文化,这就是文化精神的转生。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儒家系列》是按照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儒家文化精神延续、承传转生的特点而选择入选人物的。先秦孔子、孟子和荀子是儒家文化的开创者和完善者。孔子以仁为宗旨,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范式;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思想中的心性之学,确立道德心性主体的内圣成德之学;荀子则继承发展了孔子思想中的天人之学和外王事功之学,使儒学“仁”——“性”——“天”的理论体系得以建立。

两汉至隋唐,适应于新的文化环境,产生了经学儒学。秦始皇以打天下的法家之学来治理天下,强秦很快灭亡。汉初知识分子深刻反省这一历史教训,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需要。董仲舒援阴阳家、名家、法家入儒,把各家思想和合起来,使元典儒学实现了转生,适应了汉代大一统新形势、新时代的

需要。从汉至唐，外来佛教文化和本土道教文化逐渐兴盛。唐代在形式上采取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的政策，以其文化的多元性适应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要。三教相互诘难，亦相互吸收，促使学术的发展。然韩愈激烈排佛批道，以恢复儒家仁义内涵，企图与佛道抗衡。他所开启的古文化运动，即儒学复兴运动，开宋明理学之端绪。

宋明时开创了理学儒学。唐末五代十国的长期动乱，对儒、释、道三教都是严重的破坏，寺院经济衰落，社会失序，道德沦丧，都需要在新的文化环境下进行重建，宋明理学家把儒、释、道三家思想和合起来，实现了儒家文化精神的转生。理学的奠基者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二字，开理学一代之学风。朱熹和合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的理气、道器、无极太极、动静之学，集理学中道学之大成，称为程朱道学（亦称理学）或程朱学派。陆九渊与朱熹相抗衡，主张心即理而创立心学一派，王守仁创造性地解释孟子和陆九渊的心性之学，提出“致良知”主张，集心学之大成，称陆王心学，或陆王学派。王夫之承张载的气哲学，提出“理即气之理”，“理在气中”等思想，集张载以来气学之大成。

理学儒学形态经由程朱、陆王、张王，而使传统儒家理学文化理论建构趋于完备，影响日本、朝鲜、越南，且朱子学和阳明学成为日本的显学，朱子学成为朝鲜、越南的显学，从而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影响深远。

近代儒学是在西方文化以其炮舰和鸦片毒品走私的侵略下，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儒家学者在中国被西方所打败的强烈刺激下，在学习、融会西方文化的情境下，把西方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引入儒学仁的思想，儒学表现为新学的形态，称新学儒学。其代表人物为康有为、谭嗣同等。由于与其他专题冲突，故“儒家系列”中未收。

儒家文化精神在其发展的元典、经学、理学、新学等四个阶段，都经过冲突、融合而和合为新的文化生命，而转生为每

个时代所需要的,适应新文化环境的儒学。这种文化生命的转生,亦是儒家文化精神生生不息的过程。

儒家文化中许多糟粕方面,虽然与其生长的社会土壤一起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亦会延续下来。诸如专制主义,独裁主义,官僚主义,宗族主义,任人惟亲,血缘等级,特权观念,家长统治,个人崇拜以及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等等思想,都需要每个人警惕自省,不使其在现代社会中借尸还魂或死灰复燃。

是为序。

1994年7月

1995年10月重写

前言：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韩愈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 768 年),经德宗、顺宗、宪宗,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 824 年)。史家一般把唐玄宗后期至穆宗这 80 年左右的时间称做“中唐”。韩愈就是活动于中唐时代的一位历史人物。

中唐,时间并不长,但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文学史家们却都把它当作一个单独的历史时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说这个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宋人朱熹从“文章”与“国家”的关系出发谈道:“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①这是说时至中唐,唐王朝的“国家”已开始衰落了。而清人叶燮在论及唐诗分期的时候又指出:

后之称诗者胸无成识,不能有所发明,遂各因其时以差别,号

①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之曰中唐，又曰晚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时值古今诗运之中，与文运实相表里，为古今一大关键，灼然不易。（《百家唐诗序》）

这段话虽是从文学史着眼，但却跳出了有唐一代，突出强调了中唐之中“乃古今百代之中”。朱熹与叶燮的这些话，是否已经透露出这样的意思：中唐、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都在这里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一个由盛而衰的转折。

当然，历史是具体的。这种转折是通过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变表现出来的。

一个封建王朝的衰落，往往是从皇帝的腐败开始。唐玄宗后期即已腐败。始而骄，以为天下大定，万民拥戴，陶醉于自己的胜利之中。由骄而奢，声色犬马，耽于淫乐。又由骄、奢而昏，以阿谀逢迎、勤于进奉者为忠，以正直无私、勇于进谏者为逆，委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小人以重任，贬宋璟、张嘉贞等君子出朝。遂酿成安史之乱，国运从此一蹶不振。而唐德宗之腐败又远过之。此人之奢可谓前无古人。一是贪进奉。从中央到地方，文武百官皆须献纳，美其名曰“税外方圆”、“用度羨余”；年有年进，月有月进，无止无休。文武百官亦借此为升迁之阶，同时中饱私囊。二是兴“官市”。以宦官为“官市使”，招纨绔无赖子弟为“百望”，见市有中意之物辄霸占之。“率用百钱买人值数千钱物”，民“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官市，而实夺之”。^①三是设“五坊”。令人采办鸡、狗、虫、鱼等各种宠物，养于“五坊”中，供自己玩乐。五坊小儿率蛮横欺人，“至有张罗网于门不许出入者，或有张井上者不得汲水，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②此人之昏亦属少见。一批腐朽官僚和奸滑宦官被长期重用，而秉性正直、略有见识者如宰相陆贽、节度使段秀

① 韩愈：《顺宗实录》。

② 韩愈：《明宗实录》。

实等皆先后被贬，并一贬不赦。皇帝腐败自然招来大批腐败分子菌集周围，从而带动了整个统治阶层的腐败。

皇帝的腐败导致了宦官专权。宦官以侍上媚主为本职，且与皇帝朝夕相处。对于一个骄奢昏庸的皇帝来说，宦官就成了最亲近、最可信赖的人。唐初规定宦官不得登三品，为不使其有权。唐玄宗开始重用宦官，破例授杨恩勳从一品。并派宦官以钦差大臣身份充任监军，权在将帅之上，创宦官掌军权的先例。唐肃宗在平安史之乱时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统领全国地方兵力，使宦官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德宗朝任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军监军，后又杀死神策军大将军，任窦、霍为护军中尉，使掌全权。神策军是朝廷禁卫军，地方部队将领多自神策军出，各地方部队又多请隶属神策军为“神策行营”，故掌握了神策军的军权就等于掌握了全国的军权。宦官俱文珍、薛盈珍等亦备受重用。朝廷已成为宦官的天下。

如果说皇帝腐败、宦官专权在其他朝代也常有发生的话，那么唐代中叶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现象，就是藩镇割据。唐玄宗为向外扩张，在边镇广设节度使，执掌一个地区的军政大权。有的节度使靠拓边和进奉取悦于好大喜功的唐玄宗，借以壮大自己，逐渐成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野心勃勃的军阀。安史之乱就是这样爆发的。为平息安史之乱，朝廷不得不借助于其他藩镇，又不得不安抚安禄山的部将，结果反而促进了藩镇割据的普遍化。因而安史之乱的平息也就是藩镇割据局面的初步形成。这些割据一方的藩镇，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距离独立王国就只差世袭继承制了。于是，在德宗朝时发生了河北幽州、成德、魏博三镇节度使议谋传子之事。开始德宗不允，他们便起兵反唐，朝廷与藩镇的战争再度爆发。经数年战乱，三镇宣布依然归顺唐朝，朝廷也实际上答应了他们的传子要求，只是办一个任命的手续罢了。事后其他藩镇争相仿效，传子制遍及诸藩。传

子制的确立,说明藩镇已经成了实际上的独立王国。

皇帝腐败、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这就是唐代中叶的几个主要特征。但这不是说唐王朝至此气数已尽,一天也维持不下去了。不是的,唐代中叶两次朝廷与藩镇的战争都表明:虽然朝廷已经没有力量真正平定割据势力,但割据势力也还没有力量推翻朝廷。实际上,在第二次朝廷与藩镇的战争之后,唐王朝还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史称“中兴”。但是,无论如何,唐王朝已经越过了它的辉煌的顶峰,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安史之乱也许是个偶然事件,但这个偶然事件却在唐代历史上划出了一道清晰的分界线:此前,是沿着曲折的道路上升;此后,是沿着曲折的道路下降。皇帝腐败、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等等都是具体的历史现象。但这些具体现象却在唐代历史上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转折期:既不像盛唐的气象峥嵘、五色绚烂,也不像晚唐的百卉凋零、一片衰飒,而是出现了许多弊病需要解决,提出了不少问题需要思考,不景气也不明朗,复杂而烦闷。

而且,这个转折也不仅属于唐代。如果说皇帝腐败、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等一些具体事件造成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由盛而衰,理由显然是不充分的。但是,如果我们暂且撇开因果问题,看一看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部兴衰史,就会发现:我们上面仅就唐代而说的安史乱前是沿着曲折的道路上升、安史乱后是沿着曲折的道路下降的话,对于整个中国古代也是适用的。自先秦以迄中唐,虽然也有起伏,但总的趋势却是从一个高峰跃上一个更高的高峰;自中唐以迄明清,虽然也有兴衰,但总的趋势却是一步一步地衰落下来。宋代虽然也绵延三百余年,但从来没有真正强盛过;内忧外患始终伴随着它,后一半时间就只好退守江南以苟活了。宋代盛产民族英雄,但谁都知道这正是国家衰弱的标志。元代仅靠少数民族的武力维持了不足百年,故不足深论。明代复有江山统一之盛,明人也好做雄汉盛唐之梦,连文人也叫喊“文必秦汉,诗必

盛唐”；但明代的真正贡献是市民阶层的抬头和叛逆思潮的兴起，这无异于敲响了传统社会体制的丧钟。清代对传统社会体制的荒谬的延长几乎葬送了中华民族走向近现代的自新能力，所造成的民族悲剧我们至今还要承担，有人却在那里吹捧什么“康乾盛世”、“乾嘉盛世”，真不知是何居心，也许是真的把回光返照当成了旭日东升？总之，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兴衰史上，盛唐是一个光辉壮丽的顶峰；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社会就从它向上发展的顶峰上滑落下来，开始了下山的路。而中唐，正是这条下山之路的起始阶段；尽管它的绝对高度不一定很低，但毕竟是在下山。微观的历史事实永远不能充分说明宏观的历史之路。我们只能说，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可能万古长青，都必然要在现实生活的推动下经历它的兴、盛、衰、亡。一个民族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传统的社会形态，使之尽可能地延长，而在于不失时机地转变社会形态，弃旧图新。关于历史发展的深层的因果律还是让历史哲学家们去研究吧！在说了上面的许多话之后，我们只是想重申叶燮所指出的：中唐“为古今一大关键，灼然不易”。

这样一个转折的时代，一个由盛而衰的时代，它需要什么？它向人们提出了什么？

它需要挽救，挽救它的衰势。

它要求人们思考：这种衰势是怎样形成的？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是疏忽了什么？丢掉了什么？还是混进了什么？

它要求人们行动：恢复点什么？改变点什么？还要充实点什么？

我们的韩愈就生逢这样一个时代，就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

他是有为的。他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投进了他的时代，思考着，同时也行动着。

他活了 57 岁。这在中国古代不算很短，但也不算长。在这 57 年中，他有不少时候其实是很艰苦的。他也像中国古代